
外资主导型出口导向战略的“大国困境”： 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困境与对策

时 磊

(扬州大学 经济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9)

[摘要]文章通过对当代中国,尤其是长三角地区近年来面临的国际贸易条件恶化、资源和环境问题导致的企业脆弱性进行分析,得出结论:长三角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是工业化发展战略导致的,文中称之为外资主导型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的“大国困境”。接着文章分析了大国困境的形成原因,认为缺乏国内市场开发、工业技术的弱原创性是导致大国困境的根本原因。更为严重的是,工业化战略的内在缺陷会导致经济发展中对这种战略的依赖性会不断加强。然后分析了长三角地区是如何走上这一条外资主导型出口导向之路的。文章认为,低下的工业技术基础、狭小的国内市场和无效率的金融制度是这种外资主导型工业化战略的形成原因。

[关键词]外资主导型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大国困境;技术弱原创性

[中图分类号]F061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097(2010)05-0048-04

“Big Country Dilemma” in the FDI-oriented Strategy of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Problem s and Solutions of Yangtze River Delta Econom ic Developm ent

SHI Lei

(School of Economic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9,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rgues in China, especiall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we face with worsening condi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We sum up that the Yangtze River Delt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sue is a resul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which we described it as a “Big Country Dilemma” in the FDI-oriented Strategy of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Then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Big Country Dilemma” that the lack of domestic market development, industrial technology, and weak originality. Even more serious is that the drawbacks inherent in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will lead to

[收稿日期]2009)12)15

[作者简介]时 磊(1982),男,河南南阳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经济发展。

the dependence of such strategies and then we analyze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is how to go down this road of an export-oriented. Finally, there are conclusion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Key words: the FDI-oriented strategy of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the big country dilemma; weak originality

近年来, 中国与美国、欧盟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纺织品、钢铁、轮胎及部分家具家电产品上产生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另一方面, 由于受中国因素的影响, 国际原油、铁矿石、铜等大宗商品价格都出现过较大幅度的上涨。以长三角为核心之一的中国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面临着十分不利的国际市场环境, 产品价格不断降低, 企业利润率下滑, 出口型企业的脆弱性不断加剧, 且与此同时, 原材料价格却不断上涨。企业脆弱性加剧会延缓企业本身的技术研发能力培育, 延缓提高企业工人福利的进程, 这都会影响长三角地区乃至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这种极其不利的外部环境是如何形成的? 诚然外部原因不可忽视, 但是长三角地区, 乃至整个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战略选择的失误也难辞其咎。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工业化进程更多遵循日本、四小龙所创造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化模式, 这种工业化模式比较接近中国的资源禀赋结构, 所以比之于学习西方和苏联模式时代, 创造了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和过程。但是, 我们进一步分析, 作为一个融入工业化过程的大国, 中国的工业化过程给世界市场带来影响远远不同于市场和经济规模狭小的“四小龙”, 也不同于国内市场开发较为有力的日本。本文将当前长三角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归结为外资主导型出口导向战略的“大国困境”, 正是这一困境导致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的外部贸易条件恶化。最后我们认为, 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中必须要加大国内市场开发, 降低国际贸易依存度, 同时要加大技术创新, 更好地利用本国更丰富的廉价要素, 才会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大多数企业面临的脆弱性问题。

一、“大国困境”内容及形成原因

1. “大国困境”的内容

本文将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 在长三角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的经济困境归结为外资主导型出口导向战略下的“大国困境”, 它的主要表现有两点: (1) 越来越不利的国际贸易条件; (2) 资源与环境的压力与约束。而这两点综合起来的表现就是企业的脆弱性, 企业的产品价格有不断下降的趋势, 而企业的原材料价格却有不断上涨的趋势。

2. “大国困境”的形成原因

中国越来越不利的国际贸易条件的形成原因主要是, 中国远远超越自身市场容量的工业生产能力和这是其他实施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的国家或地区同样遇到的。但是却从没有一个拥有如此庞大工业生产能力的国家向世界市场如此规模巨大地倾销廉价产品。不可否认, “外资主导型的出口导向战略”在中国特定发展阶段具有重要的贡献。在经济发展早期, 这种战略选择有效地避开了资本缺乏、技术缺乏和经营管理人才短缺的劣势, 也解决了由于国内人均收入较低导致的国内市场狭小问题。

这一战略通过大量吸引外资的方式有效地保持经济生产能力的高速增长, 加快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力度。但这一战略也存在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正是导致“大国困境”形成的原因。我们这里主要指出两个: (1) 国内市场开发力度不够。国内市场开发取决于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及其分布。“外资主导型的出口导向战略”虽然推动了人均 GDP 的提高, 但是由于劳动力充裕导致的资本强势, 大部分经济发展的成果被外资以资本利润形式拿走, 中国国民的人均收入提高速度慢于经济本身成长速度。

与此同时, 由于外资企业、出口企业选址集中, 不像 80 年代乡镇企业的遍地开花, 这加剧了不同区域、不同人群收入分布的不合理, 从而会抑制随着经济发展过程的国内市场开发。国内市场开发不力势必更加依赖于国际市场, 这样经济发展只会加剧贸

易条件的恶化,企业本身的生存困境难以得到根本性改善。

(2)工业技术的弱原创性。近年来,环境与资源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从资源的角度看,中国近年来不断面临淡水河谷、力拓等国际矿业巨头的提价压力,国际原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都是中国企业头上的一把悬剑;从环境的角度看,近年来,中国土地资源、水资源的污染和浪费令人触目惊心,长三角地区多次出现的水污染事件都折射出中国工业化战略选择的问题。中国工业技术的弱原创性和强模仿性是这些资源与环境问题的根源。

不可否认,作为后发国家,向先进国家学习技术是重要的促进经济发展的途径(林毅夫、刘培林, 2003) [1],但是技术的不完全可复制性是其重要的特征之一。中国工业发展过程中产生资源短缺现象和环境压力,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工业发展必须因循西方工业发展所决定的技术路线;在西方工业发展中所形成的既定技术路线,同中国的资源禀赋条件存在明显的差异(金碚, 2005) [2]。中国能源短缺在很大程度上是能源利用结构同资源禀赋结构矛盾的表现,中国工业增长的资源约束,本质上是西方工业技术路线同中国自然资源禀赋之间的差距。西方技术能够有效地利用的是中国不很丰富的资源(例如,石油)而不是中国比较丰富的资源(例如,煤炭)。日本、四小龙创造的技术和工业化模式也与此类似,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资源禀赋结构。

但是, 90 年代以降,长三角地区为核心的中国经济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工业转移,这种工业技术的转移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但是也加剧了中国资源的短缺和浪费。中国工业技术的原创性弱而转移性(模仿性)强(且往往是低成本转移和模仿),是资源和环境强约束的基本根源。中国转移和模仿了西方的工业技术,沿着西方既定的技术路线发展工业,而能源禀赋结构却不相适应,导致或加剧了工业发展的能源和资源供应约束,从而加剧了企业本身的脆弱性。而且由于中国技术研发的问题,中国普遍实行同西方工业发展的既定技术路线不同的另一工业技术路线,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

二、外资主导型出口导向战略的缺陷

不能否认,中国的外资主导型的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繁荣。这种战略的成功是在中国国内市场开发不力、国内市场地方割据(沈坤荣、李剑, 2002) [3]的情况下,国内技术研发能力严重不足的条件,国内金融体系运作效率低下的局面下,有效地利用国际市场与国际资本,有效地发挥中国简单劳动力十分充裕的比较优势的情况下取得的。中国经济保持了 80 年代以来的持续高速增长的良好局面,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持续上升,人民生活水平、国家工业生产能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是这种战略的缺陷也同样明显,而且更不幸的是,这些缺陷又加剧对这一战略的依赖性。这种工业化战略的典型模式被称之为“苏州模式”。苏州模式与以往的韩国、日本的出口导向型模式不同,它的实质是一种以招商引资来发展出口加工工业的外向型经济的典型模式(张晔, 2005) [4]。

这种工业化模式引发的一系列的示范效应在政治竞争的推动下,促使外资主导型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成为中国东南沿海,甚至全国普遍推进的一种工业化战略,这主要表现为各地轰轰烈烈的招商引资运动。张军(2002) [5]指出,外资可以解释 90 年代以来中国东西部差距的 90%,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 90 年代后期以来内陆省区也开始掀起轰轰烈烈的“招商引资”运动。这种在中国国内广泛推开的模式与以往的出口导向型战略不同,它可以不受制于国内的资本筹集能力和技术水平、人力资源水平等而依靠从外部引进的办法来迅速地实现工业化,这就是外资主导型的主要含义。

但是这种模式的基础是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这种低廉劳动力价格不是表现为劳动力的低工资,而是低福利。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以农民工群体为主体的工人阶层得不到足够的社会福利是这种工业化战略的核心竞争能力。但是,低廉劳动力价格和低福利会加剧国内的市场得不到有效地开发,由于这一原因会导致中国的工业生产对世界市场的依存度越来越高,远远超过了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日本、韩国在同一发展阶段的水平。另一方面,劳动力价格低廉和低福利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不利于技术水平的转型。马克思(1975) [6]认为,劳动力的价值是生产再生产劳动力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不仅包括再生产劳动力本身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即衣食住的基本需要,还应当包括培育培训劳动力的费用以及工人家庭特别是工人子女的生活费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

力的培育培训费用及工人子女的费用已经成为社会再生产中工人工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中国通过各种措施形成的低劳动价格正在扼杀劳动力的长远的供给能力。将工人永远定义于简单地出卖自身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就相当于扼杀了中国经济的未来,中国工人的低工资已经到了可以扼杀技术进步的程度。

国内市场的开发困难与世界性的制造业向中国转移,形成了中国外资主导型出口导向战略。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而不是世界市场的角色,正在制造着世界性的通货紧缩。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发现,把中国作为生产基地比作为销售市场更容易赚钱。作为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如果中国越来越多地生产出产品的话,狭小的世界市场会越来越难于消化如此庞大的生产规模。但是,与此同时,中国政治竞争导致的地方政府之间的招商引资竞赛并没有终止,而且在不断加剧。中国的地方政府掌握着大量的资源,例如土地、银行贷款,还对法律执行力度有着重要的影响力,这些都成为地方政府竞相引进外资的手段。在工业生产大国困境已经形成并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并不能够有效地遏制这种战略继续狂飙的势头,大国困境并没有缓解的迹象。

出口导向战略的”大国困境”正在一步步形成并加剧,中国作为一头”工业巨兽”的增长正在导致全球原材料、能源供给价格的上涨,且与此同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加剧了世界性的通货紧缩。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缓冲期结束后,欧美国家纷纷取消了对于中国纺织品的进口配额,但是迅速增长的纺织品进口以及大量服装的涌入,欧美与中国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事实上正是中国自己制造了不利的贸易条件。另一个方面,世界石油、铁矿石及其它原材料价格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上涨与波动。这种战略本身的推进加剧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扭曲。出口、投资与消费被称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是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显然不同的是,中国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任何一个大的经济体都要低,而且还在不断下降,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占GDP的47%下降到了2006年的36%。2001年以来到金融危机爆发这一较长时期的中国繁荣几乎完全得益于出口的超乎寻常的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在大国困境的背景下是不可持续的。

三、长三角地区的外资主导型出口导向之路

外资主导型出口导向战略的典型模式就是苏州模式,整个长三角地区是中国最为典型的外资主导型出口导向工业化地区,尤其是江苏和上海。浙江也属于出口导向型地区,但外资的影响力要小于江苏和上海,但是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并不进行较为细致的区分。而至于在更为广大的泛长江三角洲地区,用这一工业化战略来描述90年代以来的工业发展战略,我们认为也大体是合适的。那么问题是,长三角地区的外向型之路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主导的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会是外资主导型的出口导向战略?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利于我们对问题的解决。

1978年站在历史关口的中国,对建国后中国工业化战略选择进行重大反思。这主要包括两个层面:对外经济战略层面和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战略层面。经过痛定思痛的反思,中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对外开放与经济改革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更具体的层面是,中国改革了原有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大规模实施分权式改革。分权改革条件下,各个地区自主地根据自身资源禀赋结构与自然条件、原有市场条件等选择适合于自身经济发展的工业化战略。在80年代中国既出现了以内源式发展 as 特征的”江浙模式”(陈建军,2000)[7],也出现了以外向型为特征的”广东模式”。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经济增长的两极(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都相应地转入到了出口导向型轨道。为什么在80年代成功实现了内源式增长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会走上出口导向之路呢?

现有文献认为,大多数采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的国家大都面临着以下困境中的一个或一些:(1)国内市场的狭小;(2)缺乏工业发展的技术与技术的自我创新能力;(3)缺乏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资金。由于国内市场狭小,相对于生产能力而言的国内消费能力的局限不仅仅制约着固定技术框架内的规模经济的实现,也制约着更高生产能力技术的采用。这种情况下对于国际市场的开发就至关重要。缺乏工业发展的技术及技术研发能力,故打开国门引进外资、外国技术以加快工业化的技术进步过程,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选择这一战略的另一重要原因。而资金缺乏的重要性没有前两者关键,回顾东亚地区发展的历程,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采用的是”外贸主导型的出口导向战略”,这首先是因为这些国家有着非常高的国内储蓄率,其次这些国家的政府融资能力及对于企业的支持力度也是世界上少有的。

“江浙模式”向外向型转变不是一个偶然现象。首先,80 年代的快速发展使得江苏、浙江市场化改革取得先发优势。国内由于计划体制变革释放的市场需求和计划经济本身固有的短缺,在工业生产能力迅速发展的时代得到相等程度的满足。其次,长三角地区的技术基础基本以土技术和断断续续的进口替代为特征,这种技术基础在短缺经济下尚且可以,在消费需求得到相当满足后,消费者开始追求产品质量、个性化特征时就显得十分落伍。这种技术基础已经难于适应市场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大规模进行技术引进势在必行。而且,长三角地区的低技术基础并不利于经济发展绕开狭小的国内市场,去拓展国际商品低端市场。一方面要提升技术层次,另一方面要开拓低端商品的国际市场,这就使得江浙模式转型的问题必然要得到解决。

那么长三角地区为什么会走上“外资主导型的出口导向战略”之路?中国存在着庞大的居民储蓄,为什么还要引进大量的国外资本?复旦大学张军(2002)认为,中国金融体制运行的无效率是大量外资进入的最为根本的原因。中国金融市场的二元分野十分明显,一个金融市场是融资成本很低,融资十分容易的体制内金融市场;另一个是融资成本较高,融资十分困难的体制外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的二元分野导致规模型企业大量地浪费廉价资金,而规模较小、体制外企业不得不面临较高的融资成本,使得很多企业 and 产业发展举步维艰。中国银行业大量资金留在银行体制内部,被地方政府的低效投资大量使用,这些都加剧了中国银行资金的短缺。中国金融资源的短缺是一种体制性短缺,不是总量性短缺。正是这种短缺使得中国不得不依赖外来资本发展工业化。金融市场的无效率使得中国经济,尤其是长三角地区,走一种不同于东亚地区外贸主导型的出口导向战略的外资主导型的出口导向战略。

与现有文献研究类似,中国国内市场由于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分配不合理,国内市场分割严重等原因导致国内市场很难以支撑起消费收入弹性较高的工业产品的大规模生产。同时国内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技术落后,管理体制僵化,难以迅速地适应国际市场对产品质量、性能与价格的要求。这二者是导致中国经济,尤其是长三角地区外向型特征产生的原因,与外资主导结合就形成了外资主导型出口导向战略。

外资的大量进入,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开设工厂的优势很快显露出来,不仅仅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而且上海、江浙地区拥有非常好的工业基础和基础设施,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发展带来的制度环境的改善。上海和江苏、浙江良好的社会控制能力,较为发达的科技教育环境,通过经济发展而形成的较好的市场条件和市场潜力,这些都使得长三角地区对外资表现出更大的吸引力,这一地区在 90 年代迅速超越珠江三角洲地区,成为中国吸引外资最多的地区。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当代中国,尤其是长三角地区近年来面临的国际贸易条件恶化、资源和环境问题导致的企业脆弱性进行分析,得出结论:长三角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是工业化发展战略导致的,本文称之为“外资主导型出口导向战略的”大国困境”。接着文章分析了大国困境的形成原因,认为缺乏国内市场开发、工业技术的弱原创性是导致大国困境的根本原因。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战略的内在缺陷会导致经济发展中对这种战略的依赖性会不断加强。然后我们分析了长三角地区是如何走上这一条外资主导型出口导向之路的,我们认为,低下的工业技术基础、狭小的国内市场和无效率的金融市场是这种外资主导型工业化战略的形成原因。外资主导型的出口导向战略带来的大国困境的克服有赖于政策的改善,根据本文分析,政府和社会可以从两个方向加以努力:

1. 加大对国内市场的开发

中国 30 年来的高速增长大大增加中国国民收入,国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随着国际贸易条件不断恶化,中国制造业生产能力仍在不断加大,怎样有效地开发国内国际市场成为中国进一步工业化要面临的首要问题。越来越多有识之士提出:我们不仅仅要

成为世界工厂,我们更要成为世界市场。自改革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实现了巨大的飞跃,这为开拓国内市场提供了较好的基础。但是,收入水平的增长和分布而不是收入的绝对水平决定着市场规模的扩张。中国需要高速的经济发展来带动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这是中国扮演世界市场角色的最重要的因素。从更为现实的意义,中国不仅仅要保持较为高速和持续的经济增长,而且要维持一个平衡的协调的经济增长,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增长的收益。中国 90 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以巨大的地区差距为代价的,正是这种“极端化”的经济增长制约着中国国内市场的开发,制约着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能力。90 年代初期中国作为“世界市场”的潜力浮出水面是由于在 80 年代中国成功地实现了较为平衡和协调的经济增长,而 90 年代由于外资在中国投入的区域性导致了中国经济日益偏离原有的“世界市场”的期望,反而成为了世界的工厂。

2. 加大自主技术创新

中国科技创新的目标、战略、项目选择、资金和人才等资源的调配,都是由政府主导的。这种自主创新研究很多并没有考虑中国的资源禀赋结构,因为研发主体并不需要考虑资金来源和社会需要,研发成果不需要市场检验,而只是需要同行的检验,这种非市场化的自主创新思路是中国工业化发展中技术弱原创性的原因之一。而且由于中国对生产要素市场的干预,扭曲的价格体系也会诱导出不同于社会禀赋结构要求的工业化技术结构,这对于资源和环境的发展是不利的,在大国困境背景下也会加剧企业的脆弱性,正如前文我们的分析。因此,自主创新必须学习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经验,走出一条依靠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的道路来,要加强科学技术研发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建立一种良好的新技术评价体系和价格体系。

[参考文献]

[1]林毅夫,刘培林. 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地区收入差距[J]. 经济研究, 2003, (3).

[2]金碚. 资源与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工业发展[J]. 中国工业经济, 2005, (4).

[3]沈坤荣,李剑. 中国贸易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J]. 经济研究, 2003, (5).

[4]张晔. “苏州模式”的反思与区域发展道路的选择[J]. 上海经济研究, 2005, (5).

[5]张军. 书里书外的经济学[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2.

[6]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

[7]陈建军. 中国高速增长地域的经济发展:关于江浙模式的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